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

语言变异的

语用顺应论研究

张艳君 毛延生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成果 (07JA740031)
本书获厦门理工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语言变异的 语用顺应论研究

张艳君 毛延生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变异的语用顺应论研究/张艳君,毛延生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615-3437-3

I. 英… II. ①张…②毛 III. 英语-语用学-对比研究-汉语 IV. H31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3967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市集美石鼓路 9 号 邮编:361021)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6.75 插页:2

字数:302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而这一现时代主旋律中的最强音往往会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得以体现，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语言。西方哲学的分化演变历程充分表明“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亦被学者们普遍看好为学术发展的大势所趋，以至于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从语言学的视角探讨哲学、法学、知识论、科学论以及伦理问题。众所周知，“语言学转向”这一术语主要是用来描述 20 世纪初以来的分析哲学运动，而海德格尔本人并没有明确表达出其哲学的某种“语言学转向”，但若深入海氏的整个哲学思想，却不难发现一条“语言学转向”的线索。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从此在的生存论环节上对语言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后期海氏将语言问题置于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地位，并有论文集《走向语言之路》问世。援引海氏的原话，即：“语言是世内在手的工具吗？抑或它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语言以何种方式存在，竟至于语言会是‘死’语言？语言有兴衰，这在存在论上说的是什么？我们据有语言科学，而这门科学以为课题的存在者的存在却晦暗不明，甚至对此进行探索追问的地平线还隐绰未彰。”

在不断发展的时代面前，语言又呈现出怎样的一番光景？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对于语言哲学研究还是对于语言本体研究来讲，这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们并不否认传统语言研究的优点与强势，但这些方法却很难摆脱逻辑实证主义研究的桎梏。如何能够让我们对语言的把握由抽象的思维走向具体的交际，由片面的分析走向全面的整合，这才是发展中语言研

究的最终归宿。显然,极富时代特色的“语用学转向”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路向。确切地说,在语言游戏的平台上,语言结构的意义取决于其具体用法,即取决于它们在具体规则指导下的“生活形式”中的使用,并且这种使用包含了一个前提,即与规则相互缠绕在一起的语言就是言语行为,因此规则也不再是本先存在的句法规则,而是用法原则。语言结构和意义的关系正是语用学转向的枢纽与初衷,也是所有语用研究理论的根基所在,语言顺应论也不例外。

语言顺应论作为一种极具发展潜势的理论模式,其较为全面的解释力源自对用法原则的青睐与珍视。也正是因为如此,该理论模式可以为我们认清发展中的语言演化提供一个全新的具有支撑性的分析视角。借助于语言顺应论,我们可以更为合理地诠释能够体现时代变迁的语言变异现象,析取出其中所蕴涵的语用元素。这样,我们不但可以完成语用学分析的任务,同时还可以间接地触及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认识自我——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卡西欧《人论》,1985:3)。这其实一点也不足为怪,因为无论是语言顺应论还是语言变异现象在本体和认识论上都具有夯实的现实前提。

根据目前国内语言顺应论以及语言变异的研究状况,就笔者所知,从语言顺应论的视角对语言变异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尚无先例。我们选择从语言顺应论入手挖掘语言变异深层理据及规律有助于深入了解语言使用的语用特征,这种动态的研究视角对于剖析语言变异产生的顺应机理与规律大有裨益,也可为将来的语言变异方向预测提供参考性指南。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考虑语言使用的多层选择共进与整合特点,顺应论关照下的语言变异研究可以折射出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化属性与认知特点,更可以廓清二者在析取语言功能、衡量语用效果、优选语用形式上的重要作用,这对语用修辞理论构建、语用优选论限制层级设定、词汇语用学研究的纵深展开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尽管笔者力求竭尽心智而创新求尖,但是我们自知才疏学浅,更何况语言顺应论从诞生到今天才短短的20年时间,理论本身还有诸多尚待完善之处。但我们

还是坚信：唯有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课题才是具有可挖掘的潜质的。正如伯格林所说，对新的对象必须创出全新的概念。面对语言变异这种时时新、事事新、处处新与世世新的发展现象来说，我们有必要赋予它全新的语用诠释，因为语用性思维正日益走近乃至踏入我们的生活。本书作者力求避免浮词充斥抑或大言欺人，将研究的起点立足于语言顺应论这一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同时以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鲜活语言变异事实作为分析语料。这些都是我们力求保证本研究“坚实、尽形、尽势”的表现。

本研究有幸得到 2007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资助。全书由张艳君教授统筹规划，并与毛延生副教授（博士）分工合作完成，其中张艳君教授完成 20 万字写作，毛延生副教授完成 10 万字写作，然后交叉校对、润色，最后由张艳君教授斟酌定稿。在本书撰写过程中项目组成员提供了一些语料和资料，其中博士生导师杨玉晨教授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笔者所在院系的领导提供了宽松的科研环境。厦门大学出版社牛跃天先生的细致编辑工作使得本书得以如期出版，作者在此一并致谢。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与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

2009 年 12 月

目 录

前言

上编 研究背景

第一章 导 论	(3)
1.1 研究对象	(3)
1.1.1 语言变异的界定	(3)
1.1.2 语言变异的诱因	(5)
1.2 研究现状	(9)
1.2.1 语音变异研究	(10)
1.2.2 词汇变异研究	(11)
1.2.3 句法变异研究	(13)
1.2.4 语体变异研究	(15)
1.3 研究方法	(16)
1.4 研究意义	(18)
1.4.1 语言本体意义	(18)
1.4.2 语言政策意义	(20)
1.4.3 语言习得意义	(22)
1.5 全书结构	(24)
1.5.1 上编结构	(24)
1.5.2 中编结构	(24)
1.5.3 下编结构	(25)
本章参考文献	(25)

第二章 语言顺应论概说	(29)
2.1 顺应论的理论缘起回眸	(30)
2.2 顺应论的建构基础探析	(31)
2.2.1 顺应论的哲学基础	(31)
2.2.2 顺应论的心理学基础	(32)
2.3 顺应论的理论观点说略	(35)
2.3.1 顺应论的两个全息思想	(35)
2.3.2 顺应论的三个核心概念	(39)
2.3.3 顺应论的四个分析视角	(40)
2.4 顺应论的实际应用扫描	(52)
2.4.1 顺应论与双语翻译	(52)
2.4.2 顺应论与话语使用	(54)
2.4.3 顺应论与话语理解	(56)
2.5 顺应论及其应用批评	(58)
2.5.1 顺应论中的意向性	(59)
2.5.2 顺应论中的合作性	(63)
2.5.3 顺应论中的优选性	(70)
本章参考文献	(77)

中编 研究论证

第三章 语音变异的顺应性解读	(87)
3.1 语音变异的界定	(87)
3.2 语音的可变异性	(90)
3.2.1 单音变异	(90)
3.2.2 连读变异	(91)
3.2.3 语调变异	(94)
3.3 语音变异的可商讨性	(98)
3.4 语音变异的顺应性	(100)
3.4.1 个案一:以英语字母 d 发音为例	(102)
3.4.2 个案二:以英汉语音委婉语为例	(105)
本章参考文献	(111)

第四章 词汇变异的顺应性解读	(112)
4.1 词汇变异的界定	(112)
4.2 词汇的可变性	(114)
4.2.1 词形变异	(114)
4.2.2 词义变异	(116)
4.2.3 词性变异	(121)
4.3 词汇变异的可商讨性	(123)
4.3.1 显性意义与隐性意义	(124)
4.3.2 主观词义与客观词义	(125)
4.4 词汇变异的顺应性	(126)
4.4.1 个案一:以形容词逆向修饰为例.....	(126)
4.4.2 个案二:以新闻话语中数字为例.....	(135)
本章参考文献.....	(148)
第五章 句法变异的顺应性解读	(151)
5.1 句法变异的界定	(151)
5.2 句法的可变性	(153)
5.2.1 语内变异	(153)
5.2.2 语际变异	(156)
5.3 句法变异的可商讨性	(159)
5.3.1 句法的语用内涵回顾	(160)
5.3.2 句法的语用内涵假设	(161)
5.3.3 句法的语用内涵论证	(163)
5.4 句法变异的顺应性	(170)
5.4.1 个案一:以话语前置主位为例.....	(170)
5.4.2 个案二:以古典诗词句法为例.....	(178)
本章参考文献.....	(184)
第六章 语体变异的顺应性解读	(189)
6.1 语体变异的界定	(189)
6.2 语体的可变性	(192)
6.2.1 正式语体与随意语体	(193)

6.2.2 既定语体与创新语体	(194)
6.3 语体变异的可商讨性	(197)
6.3.1 交际意图重心	(197)
6.3.2 修辞效果牵引	(201)
6.4 语体变异的顺应性	(203)
6.4.1 个案一:以异步交际语篇为例	(203)
6.4.2 个案二:以网络广告语言变异现象为例	(214)
6.4.3 个案三:以闽南方言和普通话切换为例	(218)
6.4.4 个案四:以教师课堂语码转换为例	(227)
本章参考文献	(231)

下 编 研究结论

第七章 语言变异的一致性解释	(237)
7.1 语言变异的生成机制	(237)
7.2 语言变异的重新定义	(240)
7.3 研究不足	(242)
7.4 研究启示	(245)
7.5 研究展望	(248)
本章参考文献	(250)
附录	(252)

上 编

研究背景

本编由两章构成。第一章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以及全书的结构。这一章可谓全书的提纲挈领。第二章详细交代本研究的主体理论框架——语言顺应论,主要关注其思潮缘起、建构基础、理论观点、具体应用以及理论批评。这一章的目的有二:其一,交代主体理论框架的具体情况,其二,为后续微观研究的展开奠定理论前提。

第一章 导论

语言变异肇始于语言使用者,并在语言使用者的社会交往当中得以实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系统地观察使用中的语言,我们可以更为真切地探究语言变异的动因。

——Milroy (1992)

人不是语言的建造者,而是语言的使用者,人使用的是语言系统在历史中演化的结果。因此,不强调个体或者是群体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而是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充满变体的集合在时间中的运动。

——Lass(2007)

1.1 研究对象

1.1.1 语言变异的界定

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总会遵循一定的常规(norm),即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否则交际难以顺利进行,这也是许多语法学家制定语言使用规

范,进而产生语法著作的动因^①。对于同语言规则相违背的语言变异现象,生成语法学派下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相对常规的偏离,这种变异现象的目的是造成突出(foregrounding)的语用效果,引起别人的注意,使语言文字不落俗套抑或别出心裁(徐宜良,2005)。换言之,语言变异是相对于语言常规的一种偏离,它是建立在规范的语言基础之上的对于语言规范的策略性调整。布拉格学派的主要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认为,日常语言使得语言表达已经“自动化”和“惯例化”了,以至于语言使用者很难意识到语言表达式所呈现出来的表达所蕴涵的美学潜势(秦秀白,1991)。以上可是被看作是对常规与变异的最为朴素的认识。

回到语言本体研究上来看,语言学的滥觞与发展一直都以发现以及总结语言的规律性为终极目标。但是伴随着语言学研究在规律性总结方面的辉煌成就,特别是语言的规律性和系统性被理论化以后,语言学家们往往产生过度忽视语言现实中的不规则现象的倾向(徐大明,2007)。早在1929年,语言学家萨丕尔就曾经指出过这一问题。萨丕尔(1929/2001)认为,尽管语言的规律性足以使得语言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媲美,但语言学家不应忘记以规律性为导向的语言学的条条框框只不过是千变万化的社会文化行为的一种概括性的总结。

当我们徜徉于社会群体当中之时,语言是一种具备无限变异可能的人类活动,这是因为语言就是群体的历史遗产,长期社会使用的结果。语言的变异同其他所有创新性努力一样——可能并不是能让人意识得到,但却如同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规约以及艺术一样真实。语言是一种非本能的、习得的文化行为。

(p. 4)

此后,语言学研究中一度受到冷落的语言变异现象逐步赢得自己应有的

^① 语言使用的规范性可以在人的社会性上找到启示。例如,石毓智(2004)在其社会平均理论当中提出:“语法现象的产生往往是有理据的。很多语法规则是现实规律通过人的认知在语言中的投影。那些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基本的、显而易见的规律,就有可能通过人们的认知投射到语言中去。‘现实’包括客观世界和人们所生活的社会。人具有社会性,每个人在日常活动中,都会受到这样那样的信息的刺激,产生交际欲望。经常作为刺激人们交际欲望的信息表达式就有可能固定下来成为一种语法格式”(p. 16)。

学术地位,成为当前语言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语言变异的主导方式有三种,并且这三种变异方式相互关联,具体表现为历时变异、地区变异和社会变异(Holmes,1992)。当然,语言内部结构因素亦是导致语言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据此,本书中的变异不但涵盖社会性变异引起的历时变异,同时也包括地区变异以及语言内部结构变异引起的种种变异。无论哪一种变异形式,从表面来看其变异的可能性不外乎三种:变化(指最终被广为接受的语言变化)、潜在变化(指最终未被广为接受,但在一定程度上被接受的语言变化)和使用错误^①(指纯粹的语言误用)(Milroy,1992)。可见,本书中的语言变异内涵较为丰富,因为它不但包括了语言变化,同时还包括语言创新^②。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有其背后的相应理据,而本书的任务就是从语用学的视角挖掘语言变异后面所隐藏的现实性理据所在。

据此,本研究将语言变异界定如下:

语言变异是一种带有一定稳定性、普遍性的动态现象,其生成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时空性、可见性,具体表现在语言使用的各个层面之上。

1.1.2 语言变异的诱因

综观语言学研究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语言变异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常规与强势范畴。历史语言学范式下的语言变异研究着重于从历时角度描述语音变化。就时间维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语音变异研究可以看作是语言变异研究的主体研究焦点。但是,随着后来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尤其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语言变异研究重心逐渐开始转向具体

① 实际上,有关后面两种诱因,Lass和Sweet分别给出了更为精确的阐述:语言变化有线性,也有循环。Lass区分为两种语言变化的概念,一种是转移,一种是替代。转移:从A变到B,就是从A转移到B。替代这个概念为结构主义所钟爱,强调位置在系统中的稳定性,他把从A变到B看成是B取代了A原来的位置。Sweet则区分为有机变化和外部变化。有机变化是指由误听、误解、同化、渐变等因素引起的音变。外部变化则是指类推或其他外部因素等引起的变化。他认为类推是替代,而不是语音的变化。Lass认为替代并不能充分代表变化的所有形式,转移可能是一种基本的变化的机制(朱晓农、寸熙,2007:22)。

② 王馥芳(2006:1)将因为社会外部因素引起的语言变化称为语言变化,而把由语言使用者的主观心理因素(包括认知因素)所导致的语言变化称为语言创新。上述两个概念的内涵相同,但差异在于叙述的视角。我们认同这一观点,在具体研究中注意上述概念的视角差别,但从研究的普适性出发,并未作具体区分。

的语言使用实例,如句法、皮钦语以及濒危语言等等。在探讨内部语言变异机制的问题上,传统历史语言学家所寻求的是语言的内部解释,即把语言的变化归因于语言内部系统的竞争,确切地说是语言内在的结构性因素互动。对此,Lass(2007)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新的变化并非和旧的形式完全相同,只能说它们相似,具体模式是由A到B再到A'。还有一种变化,变化所指向的点会不断产生更多的变化,就像化学里的自身催化反应。在语言上,这种变化就是,语言朝着某个特征变化,而变化的结果是它最终失去了这个特征。例如,元音不断地长化,最后却没有变成长元音。变化本身只保证某种运动的方式,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所谓的创新,都是借用已有的语言形式,赋予新的功能,或者是元素的重新组合,而且可以选择的范围是有限的。

(p. 23)

与历史语言学家观点不同,社会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变异是社会规范的变化所催生的,这一点明确地体现在拉波夫(Labov, 2001)对于语言变异现象的关照以及对于社会规范的重视上,诚如冯胜利(2001)所评价的:

拉波夫深信,只有活的语言才能告诉我们变异的真谛。就是说,研究变异必须求诸社会语言的实例。因为拉波夫认为,我们不能离开语言的社团、方言,意即说话者的社会背景来谈论所谓语言事实,不仅是方法问题,也是理论问题——语言学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实践基础上的大问题。无疑,拉波夫把自己的语言研究坚实地建立在语言的社会基础上。但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语言学的目的是研究语言而不是社会,尽管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社会,同时它的成果也可以服务于社会。

(p. 18)

功能语言学家所注重的是外部解释,即认为语言变异的主要诱因在“人”不在“语”,例如经济性原则或省力原则就是其中之一。综合而言,Nichols(1984)的评价是十分到位的:

功能研究与形式研究或结构研究一样,同样珍视语法结构,但是它更为侧重的是整个交际语境:诸如交际目的、交际双方以及话语语境。功能

主义者更为认同的是交际语境促动、制约、解释抑或决定了语言结构。形式或结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有限的语料,而是应该充分意识到其描述的充分性差强人意。

(p. 97)

作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范式,从其发轫之初到目前羽翼较为丰满,认知语言学从未停止过对于语言变异现象的关注,这也是认知语言学家批评乔姆斯基学派有力的论据之一。对于语言变异现象,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变异课题的最终攻关离不开人类大脑与思维的介入,离开了认知谈变异如同扬汤止沸,不会解决根本问题。这是因为认知语言学家坚信“与人类大脑进化同步的是复杂的人类语言所带来的精密思维。大脑的进化促生了话语,而话语又反过来促进大脑进一步精密化”(Kirby,1999)。这一点更为清晰地体现在认知语言学对于隐喻的认识当中:

颜色范畴体系结构的成型是由色觉(color vision)的神经生理学、我们的颜色视锥细胞(color cones)和我们的颜色神经回路(neural circuitry)决定的。颜色和颜色范畴并非“自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它是物体和照明条件下的波长反射现象的产品,另一方面,是颜色视锥细胞和神经回路的结果。因此,颜色概念和基于颜色的推理是由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所结构的。基本范畴是由格式塔感知(gestalt perception)、心理意象和运动图式结构的。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感官运动系统就是以这种方式进入我们的概念系统的中心的。世界上所有语言中的空间关系概念都是由相同的原始“意象—图式”构成的,即图式化的心理意象。而这些意象图式似乎又是源于视觉和运动系统结构。这就形成了我们何以能把语言和理智与视觉和运动挂起钩来的解释基础。体概念似乎也是源于控制运动的神经结构……抽象概念大部分都是隐喻的,它们基于那些使用我们的感官—运动能力来进行抽象推理的隐喻。因此,抽象理智,在很大程度上而言,似乎源于身体。

(http://www.edge.org/3rd_culture/lakoff/lakoff_p2.html, 09-27, 2007)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各家语言学者对于语言变异持有不同的看法,各个流派的分析优势显而易见,但也不难看出各自研究的片面性所在。综合各家学者